

周恩来故居修复开放的前前后后

毛鼎来



同志立即在全县建筑单位抽调优秀的木瓦工。木瓦工们知道要修复周恩来总理故居，他们怀着对周恩来总理无比崇敬和爱戴之情，纷纷在单位报名，甚至有人来到故居修复组办公室，找到领导，表示决心，要求能参加周恩来故居的修复工作。故居修复组的同志和建筑主管单位仔细研究后，从报名的800余名木瓦工中抽调了260名技术熟练、手艺精湛的木瓦工参加周恩来故居的修复工作。

周恩来故居的修复于1979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3周年的日子正式开工。当时正值“四九”，天气十分严寒，大雪纷飞，工人们不畏严寒，首先在需修复房屋的周边用毛竹搭起支架，上面盖上芦席，形成一大篷，并在里面升起16个用油桶做成的大火炉，升起炉火，提高大篷里面的温度，不至于砖墙上冻，影响质量。有一天晚上，修复组的同志发现大篷里煤炭不多了，花玉华同志立即去找物资部门的同志批煤，并连夜找到拉木板的工人，将煤拉到了大篷里，保证了大篷里的正常温度。260名木瓦工分成三班，歇人不歇工，三班连轴转，有的人轮到下班了，仍不想离开，依然在干一些其它工作。在工人们齐心协力的努力下，周恩来故居房屋的修复，仅仅用了16天时间，于1979年1月24日保质保量的顺利完工。修复了周恩来故居的厅门、周恩来童年读书处、出生的房屋，复建了主堂屋、嗣母和乳母的房屋及亭子间、厨房，保证了布展组及时进行布展，为周恩来故居于1979年3月5日正式对外开放创造了条件。

“故居陈列布展组”于1978年12月就进驻周恩来故居西大院（原周恩来二祖父的房屋），在西大院的房屋里布置周恩来从出生到逝世的光辉一生图片展览。由淮安文化馆馆长张勤同志负责，并负责版面的整体设计。狄仁康、卢再彬，负责版面图片的文字编写。文化馆的丁迺武、薛宝仁、吴锡兴三同志负责绘制图片，他们用水粉画的形式绘制了周恩来总理童年时代的图片。许鸿年、毛鼎来二同志负责版面的文字书写。祁祯元负责拍摄选择照片，工农照相馆的支桂香同志负责放大照片。木工周建业负责版面制作。南京博物院陈列部副主任王英同志指导了东大院周恩来故居的文物布展陈列。

当时由于正值严冬，为了能在3月5日周恩来诞辰之前把“周恩来同志纪念馆”布置好，陈列布展组的同志在西大院的操作房间生起了炉子，不辞辛劳，每天都加班到深夜12点，有时甚至凌晨1时左右。当时加夜班（仅二两粮票，人民币二角钱，但没有一个人喊累，没有一个人叫苦，第二天按时正常上班，那时的版面布置不像现在可用电脑刻绘制作，完全

依靠人工。当时的版面是由三合板制作成，大版面是由高1.22米、宽2.24米的整张三合板制成。版面上的文字用毛笔书写，标题字和图片说明用不同的色彩、不同的字体书写。在版面的上方写字，够不着，我们就把版面放平，扒在版面上写，一天写下来，腰酸背痛，但没有一个人叫苦。经过陈列布展组全体同志共同努力，布展工作终于在周恩来诞辰纪念日之前完成。

当时布置在西大院的“周恩来同志纪念馆展览”分为：第一室，主要介绍周恩来青少年时期，从周恩来同志的出生到由法国回国之间的事情。第二室，主要介绍周恩来同志从法国回国以后到建国以来的情况。第三室，主要介绍周恩来总理关怀故乡人民和故乡人民怀念总理的情况。

周恩来总理故居的大门匾额书写的是宋体字，后由邓小平同志题写。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周恩来故居的修复和布展工作按时高质量完成，恢复了周恩来总理1910年离开淮安时的故居原貌，得到了省委、地委的表扬，周恩来总理故居按时于1979年3月5日对外开放。

1985年对“周恩来同志纪念馆”重新进行了布展，为：第一部分，周恩来同志的青少年时期；周恩来童年在淮安；周恩来同志在辽宁上小学；在天津南开学校学习和进行反帝反封建的社会活动；留学日本从事爱国活动；领导天津“五四”运动、创办觉悟社；赴欧勤工俭学、寻求革命真理。第二部分，周恩来同志的光辉业绩：在广东的革命活动；领导上海工人起义；领导南昌起义；协助毛主席领导红军长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抗日初期的革命活动；战斗在重庆；回延安参加整风；协助毛主席赴重庆谈判；在南京梅园新村与卓绝斗争；返回延安转战陕北；在西柏坡协助毛主席指挥解放战争；协助毛主席创建新中国；贯彻执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关怀少数民族的建设事业；发展统一战线；创造性地领导外事工作；关心科技文教体育事业；关怀我军革命化和现代化；人民总理爱人民；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的光辉典范。第三部分，故乡人民怀念周恩来；关怀故乡、大公无私；顶着“四害”、悼念总理；故乡人民的怀念；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界人士题词及外宾留言。

周恩来同志故居于1988年1月13日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1996年被国家教委、民政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共青团中央、解放军总政治部命名为“全国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5年被国家确定为全国百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

毛鼎来：淮安市政协特邀文史委员、淮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淮安地区历史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

如再有人问及，可说来信否认这是我的出生房屋，而且我反对引人参观。实际上，从我婶母当年在京谈话中得知，我幼时同我寡母居住的房屋早已塌为平地了。故别人传说，都不可靠。二是如公家无别种需要，最好不要使住这所房屋的住户迁移。”

1960年淮安县委感到不能再违背总理指示了，研究决定：将周恩来诞生和生活过的东边宅院，作为县委学习室和儿童图书室；西边宅院让群众住进去。1965年周恩来派侄儿周尔萃回乡说服了淮安县委平掉周家祖地，深埋了棺木，坟地交给当地农民种地。

1973年11月13日晚上9时，国务院办公厅负责人吴庆彤打来电话，传达周总理指示，当时县委副书记刘守庭接的电话，他说“总理听到了反映：1、要动员住在他家里的人搬家；2、要维修；3、要开放让人参观。是否是这个情况？总理要县委调查后向国务院办公厅汇报。”第二天，时任淮安县委常委的王宝瑾经过调查后向国务院作了汇报。11月17日晚国务院办公厅又来电话传达了周总理的三条指示：“1、不要让人去参观；2、不准动员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3、房子坏了不准维修。”11月18日淮安县委常委开会研究（参加人员有王永保、姚泽、江维邦、刘守庭、杨锡富），作了三项决定：

1. 不动员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
2. 不准维修房屋；
3. 我们要在机关干部会议上动员，不组织、不带领人去参观。

江维邦书记并说：要把周总理意见和县委这三条，向地委办公室汇报。当晚，县委就向周总理办公室作了汇报。对此，周总理表示满意。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同志逝世以后，淮安县委根据周恩来故居的房屋多年来已有不同程度的损坏，其中部分房屋严重失修，有即将倒塌的状况；根据广大干部群众对周恩来的崇敬与热爱，对于修建和开放周恩来故居的强烈要求；根据县内县外、城市农村、军队地方许多同志纷纷表示要捐款捐物、组织义务劳动的强烈愿望；为了更好地用周恩来总理光辉形象教育自己，并在今后长期更好地发挥教育子孙后代的作用，淮安县委于1976年12月18日给江苏省委、淮阴地委打报告，请求批准修

复周恩来故居。省委、地委回复：故居按1910年周恩来离开淮安时的原貌进行修复。

1978年初，淮安县委根据省委的指示，立即进行了研究，组织班子，于1978年5月23日成立了“淮安周恩来同志革命文物征集领导小组”，下设“淮安周总理故居修复办公室”，由县委副书记郭金英同志全面负责。组织班子，调集人员，设立了“文物资料征集组”、“故居修复组”、“故居陈列布展组”。

1978年江苏省成立了纪念周恩来诞辰81周年文物史料征集小组，并派省文化局廖生才同志、南京博物院陈列部副主任王英同志指导帮助淮安县对于周恩来文物史料的征集、周恩来故居的修复、周恩来故居的布展陈列工作。

1978年5月县委抽调了刘干荣、陈素萍（文化馆副馆长，江苏省周恩来文物史料征集领导小组成员）、孙桂云（周恩来侄儿媳妇，图书馆工作人员）、阮守天（文化馆工作人员）、王金牛、卢再彬（淮安师范教师）、宋立勤、王文韶等人组成了“文物资料征集组”，由刘干荣同志负责，办公室设在龙窝巷。文物资料征集组一经成立，所有人员就忙开了，王金牛同志留守办公室，接受其他同志从外地邮寄来的文物，造册登记收藏。刘干荣同志带领其他同志分头北上沈阳，南下广州，西去陕西，东进上海，顶着烈日，冒着严寒，吃辛受苦，跑遍了18个省市，走访周恩来在各地的亲属和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同志，拜访了周恩来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征集了大量的文物史料，为周恩来故居的修复布展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

淮安县委于1978年11月23日向省建委作了《关于周总理故居修复设计的报告》，并附周总理故居鸟瞰图和平面图各一张，材料预算一份。12月19日省建委副主任梁公甫、周吉和、李善余、孙文龙等同志来淮安，同淮阴地委副书记张景良、淮安县委书记陈耀、县委常委杨锡富及周恩来故居修复办公室、文物征集办公室的有关同志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讨论，进一步明确了周总理故居修复工作的指导思想和修复原则：必须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力求保持或接近1910年的原貌。1978年12月22日省建委对淮安的《关于周总理故居修复设计的报告》作了批复，要求：施工图设计由淮阴地区建筑设计室审核，经淮阴地区计委批准；要抓紧组织各方面力量施工，在保证质量、恢复原貌的原则下，尽快修复。

“故居修复组”由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胡庆堂同志负责，成员有花玉华（淮安县外事办公室科长）、狄仁康（淮安师范办公室主任）等人，他们依照周总理故居的修复必须按照周恩来总理1910年离开淮安时原状进行的原则。根据文物资料征集组提供的周恩寿（周恩来的弟弟）回忆所绘制的故居草图，并调查了周总理的有关亲属和了解总理故居情况的知情人：周尔琪（周总理堂侄）、周尔辉（周总理堂侄）、陶华（周总理堂弟媳）、李亦冈（周总理堂妹婿）、孙桂云（周总理侄媳），走访了曾经住在故居里的刘党云（周尔辉的姨兄弟）、张桂英（周尔辉的内弟家属）、杨老奶奶（房客）、胡铨等故居周边的群众，了解故居的原状，特别是时年85岁的老瓦工梁永年，其从小就跟随父亲出入周恩来故居，在其学成瓦工后，一直承担周总理故居的房屋修理。后来就是根据梁永年提供的周恩来故居已毁坏房屋的地基走向对已毁坏房屋进行了复建。

省建委批复下来后，淮安“故居修复组”的

治水有功被冤 古寺千古留名

——闲话陈潢及湛真寺

刘怀玉

寺》诗，即出自此三年之中的作品。由于该书的残本现在也找不到了，此诗转引自《山阳诗徵续编》卷3。从康熙二十五年至四十四年，不过20年时间，当然是新寺。此诗又说：

殿阁壮丽，楼观妙成。
髹漆异他寺，彫镂近等伦。
佛香晚且旋，鏤篆错奇珍。
香气结云盖，密幢锦绣芬。
岩垣匝乔木，门迳压通津。
规模既广阔，布置更更新。

从以上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到该新刹的殿阁楼观、髹漆彫镂、佛像鏤篆等等，从建筑布置到环境处理确实了不起，真是“规模既广阔，布置更更新”。可惜已毁废了，实在令人遗憾。接着诗人便产生疑惑：此寺住持是浙江来的外地人，仅用不到“旬旬”时间就建造起来了。而且占地越来越大，收的僧徒越来越多，物资充满仓库，僱用了很多杂役。“朝绅”与之往来，“大贾”为之筹划。这样“取盈用不竭”的钱非得有“亿万缗”不可。他认为“多藏必有因”，即此钱肯定来路不明。

于是他就四处打探，终于“细值得其实”，说钱是陈潢的。陈潢何许人也？陈潢（1637—1688），字天一，号雪斋，浙江钱塘人。他自幼聪颖过人，博学多才，但屡试不第。清康熙十年（1671）夏，陈潢进京寻求报国机会而无门，在返回南方途中，路过邯郸的吕翁祠。陈潢信步走进，览古思今，忧愤之余，提笔在壁上题了一首诗：“四十年中公与侯，如今落魄邯郸道。虽然是梦也风流，要替先生借枕头。”他离开祠不久，安徽巡抚靳辅也进了吕翁祠。他环

视祠内，立即被壁上诗句吸引住了，不禁叫绝。又看墨迹淋漓未干，便立即寻找到了陈潢。二人交谈，极为投契，于是陈潢便入了靳辅的幕府。靳辅凡治河之事，必相垂问，而且言必采纳。靳辅十多年来的治河成就，皆为陈潢所谋划。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皇帝赐陈潢金事道衔，参赞河务。他的治河思想是“鉴于古而不泥于古”，提出了“初首尾尾”治理黄河、淮河意见。建议在高邮向东开一条河，将西来之水由高邮湖经此河下泄入海。此议受到里下河士绅的极力抵制，而未为朝廷采纳，从此，谋主陈潢成了众矢之的。康熙二十七年（1688），即以“屯田扰民”的罪名参劾，靳辅被革职，陈潢入狱，因病死于北京。陈潢治水卓有功绩，但触犯了一些士绅的利益，遭到一些人的忌恨，朱玉即其典型的代表。他说陈潢利用了靳辅的权势，大肆贪污受贿，“致富埒朱贻”。绍隆寺僧朗极与他同是浙江老乡，便将这些不义之财存放朗极处，等辞官后回去享用。谁知不久即被查出，死于异乡，这些赃银成了无主之财。朗极鉴于当时情况，用此钱将绍隆寺重建。康熙赐名湛真寺后，朱玉到此游赏，发出了以上的感慨。

说陈潢贪污受贿肯定是不实之词，但建寺用的钱是陈潢的可能是真的。曹鏞《淮城信今录》卷9《香火志》中说：“传闻新河督之幕友陈潢寄银于此，寺得以富。”段朝翰《牧海堂诗集》（朱玉的诗集）中说：“《信今录》言，陈潢真湛真寺，遗金迷失，寺以致富……”观集中《游湛真寺》诗，曹说殆非无因。”程钟《淮雨丛谈》卷10《程公桥》中也继承这一说法：“据《信今录》

云：陈天裔遗金寺中，而寺得以大新。”

但有一点疑问：按上述说法，朗极修湛真寺当在陈潢死了之后，然修寺康熙二十五年，而陈死则在康熙二十七年。又地方志说修寺的是益轮，朱玉诗中说是朗极。假如说二十五年是第一次修，寺名改为绍隆，二十七年后得陈钱又大规模修；益轮与朗极两个名字为同一个人，那么就不存在疑问了。

据说湛真寺门前有石桥，也是用陈潢的钱建造的，所以称做陈公桥，后讹为程公桥。

湛真寺与扬州盐商黄氏有密切的关系。扬州个园主人黄至筠的父亲黄凝（1737—1786），原是个穷光蛋，后来成为大盐商，但他开始发达的地方即在淮安。据金兆燕《黄稼堂太守传》和阮文藻《尊甫个园公家传》，黄凝原名黄宁，浙江杭州人，结婚后携妻去常州依附亲友，帮人家记账。夫人去世后到扬州宿破庙，无以为生，便于乾隆十九年（1754）流浪到了淮安，住在湛真寺内，为人“佣书”，即为人抄抄写写混饭吃。黄至筠和黄尚通相面术，见到黄凝惊讶地说：“此非常人！”于是供给衣食，待之甚厚，并说来生要转生到黄家做他的儿子。和尚与地方官府有着说不清的关系，闻谷将他推荐驻淮安的官员和盐商。于是便成了官府和盐商们的座上宾。黄凝有一特殊本领，能预测市场行情，淮扬商人们听了他的指点，便能赚到大钱；他也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报酬。黄凝在淮安收获了第一桶金后，也做起盐商，并到扬州新城购置了豪宅，成为有钱的商人。商人发起来了就想当官，乾隆三十五年，他拿了一万几千两的银子买了个官当当，初任赵州知



周恩来童年读书的地方

湛真寺在地方志中的记载，最早见于《乾隆淮安府志》卷26《坛庙·寺观》。该志云：“湛真寺在淮北里，旧名绍隆，僧益轮于康熙二十五年改建。海宁俞兆晟有记。”这里传达了4个信息：一是此寺地点在淮北里，即在今河下盐河以北，原城郊公社今淮城街道所在地西南；二是原名绍隆寺；三是康熙二十五年由僧益轮改建的；四是海宁人俞兆晟有一篇“记”，此记当是记载益轮改建的起因和经过。俞兆晟字叔颖，一字叔音，号颖园，浙江海盐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传胪，授内阁学士，乾隆间官至工部尚书。此人书画，善水墨花卉。有《静思斋集》，诗为王士禛激赏。可惜暂时未能找到这本书和这篇“记”，我们一时无法说清事情的原委。

现在的寺名是康熙皇帝改的。《圣祖五幸江南全录》中记载，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第5次南巡回銮过淮安，闰四月初九日，从淮安漕运总督署出来“开船北上，有漕标三营官兵挥队跪送。御舟行至湖心寺，有僧人乘小舟叩接来。令僧近侍望寺内观看，复命，即发御前一枝，命僧人持赴河口伺候给匾。”观淮安地方志，此“僧人”为三个寺院的人：湖心寺的门口，绍隆寺的益轮和大悲寺的范宏等。这三个寺院都得到御书匾额，但都被康熙改了名字，绍隆寺即改为“湛真寺”。据说这“宸翰御书”一直供奉在寺内。

至于湛真寺的规模和建筑情况，寺现已毁废，亦无文字记载，无法说清详情。不过清初朱玉（1646—？）的《游湛真寺》诗中曾经提及，可见其一斑。诗云：“河北有新刹，赐名曰湛真。横列黄金额，镌输出紫宸。”这是说的外貌，“黄金额”、“出紫宸”与康熙赐御书匾额相合。“新刹”说明这是一座新的寺庙。朱玉，字少白，号复园。原名复，字潜斋。父亲朱日升因抗清复明，清政府将其杀死于南京狱中，并杀其全家。朱家仆人用自己的儿子换下朱复，改朱名玉。康熙二十五年（1686）成淮安府学的诸生，因国恨家仇，终身隐居不仕。著有《牧海堂诗集》。清末沈家驹藏有此书，为残抄本，仅存康熙四十四年至四十七年三年（1705—1707）的诗，这里引述的《游湛真

州，一度署理过顺德知府。乾隆五十年升任江西抚州知府，第二年他即死于江西任上。在黄凝刚到赵州时，小妾诸氏就为他生了第二个儿子黄至筠。据说当天晚上，黄凝突然看见一个老和尚领着十几个人，抬着一口朱漆棺材进了自己的寝室，恰在此时婴儿落地。黄凝立刻醒悟，说道：“闻公，你果然来啦？”话音刚落，婴儿的哭声立刻就停了，襁褓中的小儿远望着黄凝，像在注目礼。后来许多人都知道了黄至筠是淮安湛真寺老和尚转世的。黄至筠后来成了扬州最大的盐商后，曾多次进京，往来淮安，却从不进湛真寺。奇怪的是，他做盐商的房屋格局，甚至连厕所、厨房等各在什么地方，都说得一丝不差。虽然两江总督孙玉庭写过一篇《湛真寺僧投生记》，但此事真伪不值一考。它只能说明黄氏自己对自己的认识：身在扬州，根在淮安。浙江杭州是黄氏的出生原籍，淮安是黄家一朝发迹的地方，扬州则是黄氏后人成为商总和大展宏图的舞台。

陈潢不光有银行存款，他撰写的治水的经验方略也存放此寺。据说郭大昌早年曾在此寺为杂役，老和尚见他为人勤谨，办事地道，即将陈的著作一次让他看一页，若干日后看完，而他便能全部熟记于心。后来郭从事水利行当，运用陈的知识，积累自己大量的实践经验，成为一位很有成就的水利专家。

湛真寺有一些知名的和尚，除了益轮以外，文献中还提到灯岱、岳宗、闻谷等。另有一个叫道存，字石庄，上元人，出家时在江宁承恩寺，扬州西湖上桃花庵建三贤祠，请石庄去做住持。石庄一度到淮安来，做过湛真寺的方丈，扬州三贤祠由其徒竹堂住持。后来石庄从湛真寺回去，三贤祠改为菴园，三贤神主被迁至庵之桐轩。菴园的主人即程晋芳的伯父程梦星（1679—1747）。

清末，湛真寺逐渐衰败。1945年淮城第一次解放，华中银行第二印钞厂位于新城内的圆明寺，而制造钞票专用纸的造纸厂就设在湛真寺内。如今湛真寺已一椽不存了。

刘怀玉：淮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